

# 士之能者： 刘敦桢与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现代起步（下）

LIU Dunzhen and the Modern Start of Chinese Architectural History Study (Part II)

赖德霖 | LAI Delin

中图分类号: TU-0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740 (2022) 06-0055-10 DOI: 10.12285/jzs.20221130008

**摘要:** 与梁思成一样,刘敦桢是中国建筑史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但相比于梁思成,目前有关他的研究远欠深入。这不仅导致他工作的意义被低估,也使得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理路难以得到全面认识。本文试回答四个问题:刘敦桢的中国建筑史研究起步于何时?他如何与营造学社结缘?他的研究与他所处的时代有何关联?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营造学社研究范式的形成,乃至对中国建筑研究发展的特殊贡献究竟何在?在此基础上,作者论证,刘敦桢在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之前就已经是一位学识渊博、方法自觉且见地精深的学者。他与梁思成有着相似的学术关怀,分享着若干一致的治学理路,但同时也有着独特的研究视角。他与梁思成在营造学社创始者们的基础上将中学、西学和东洋学相结合,共同开辟了中国建筑研究的现代之路。

**关键词:** 刘敦桢、中国营造学社、朱启钤、梁思成、伊东忠太、关野贞、滨田耕作、田边泰

**Abstract:** Like LIANG Ssu-ch'eng, LIU Dunzhen was a key founder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stud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But compared to LIANG, current studies on LIU have underestimated LIU's contributions. As a result, ou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scholarship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Architecture (SRCA), in which LIU was a core member, remains incomplete. This paper answers four questions: When did LIU start his stud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How did he come across with the SRCA? How was his work influenced by his time? And most important, what was the uniqueness of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LIU had already been a knowledgeable, insightful, methodologically mature scholar before he joined the SRCA. Although LIU and LIANG shared similar concerns in research and took similar approaches in their work, he contributed to the SRCA with his special perspective. He and LIANG worked together with other members of the SRCA to lay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chitectural study by combining methodologies of Western sinology and Japanese *Toyogaku* with Chinese academic traditions.

**Keywords:** LIU Dunzhen,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nese Architecture (SRCA), ZHU Qiqian, LIANG Ssu-ch'eng, ITO Chuta, SEKINO Tadashi, HAMADA Kousaku, TANABE Yasushi

(接《建筑师》219期 P4-18. 上篇)

## 六、“九·一八”后

除上述有关北平故宫角楼的文章之外<sup>⑥</sup>,仍在中央大学任教的刘敦桢还在1931年的12月完成了对两位日本学者论文的翻译和补注工作。

前者是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长滨田耕作在1926年5月发表的《法隆寺与汉、六朝建筑式样之关系》<sup>⑦</sup>,后者是伊东忠太的学生、早稻田大学建筑助教授田边泰所著的《“玉虫厨子”之建筑价值》<sup>⑧</sup>。此外,他还在“壬寅孟夏”——1932年5月——对关野贞所著《日本古代建筑物之保存》一文做了译注。<sup>⑨</sup>

作者:  
赖德霖, (美) 路易维尔大学美术系摩根讲席教授。

这几项工作完成于刘敦桢31岁至35岁间——他尚未届“不惑”之年，却已充分显示出他在建筑史研究方法上的“不惑”：这就是对实物从形式到结构做法所具有的分析能力，对文献的熟练运用，以及对于同一领域前人——包括外国学者——研究，特别是日本东洋学研究的广泛了解。

不过，在具体讨论这几项工作的重要性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它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它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刘敦桢此时的心态，他工作的动机，以及他最终选择放弃教职、改入中国营造学社的缘由。——此时中国适逢一场国难，它给中国的政界、社会和学界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如何应对，体现了每个国人对国家实力、未来前途以及个人担当的认知。

1931年秋季学期开学不久，日本侵华的“九·一八事变”爆发，11月22日关东军又进逼锦州。位于首都南京的中央大学师生激愤于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而掀起抗议学潮。就在刘敦桢完成滨田耕作论文的中译和长篇补注的当天，即他在译文之后特别注明的“民国二十年十二月五日”，借住在中大体育馆的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300余人在南京举行示威游行，一路高呼“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打倒卖国政府”“被压迫群众联合起来”等口号。当示威队伍经过学校附近的成贤街浮桥时，突遭军警围攻，185人被捕，33人受重伤。<sup>⑧</sup>

不仅仅有青年学生的义愤，“九·一八事变”之后，在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中，“书生何以报国”也成为一严肃论题。身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在致友人的信中曾表示：“弟自辽东事起后，多日不能安眠，深悔择此职业，无以报国。”于是他与其同事商讨编纂有关东北史事的书籍，并很快撰写和出版了《东北史纲》一书，意在论证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驳斥日本散播的“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他自己解释说，此举是“勉求心之所安耳。惟丁此国难，废业则罪过更大，

只是心沉静不下，苦不可言”<sup>⑨</sup>。

刘敦桢的生日在9月19日。如果 he 看天津《大公报》，他会在34岁生日当天得知日本占领沈阳的消息。<sup>⑩</sup>他曾留学日本，他对待日本侵华的反应如何？他在国难当头之际翻译三篇日本学者论文时的心情怎样？他想通过自己的工作表达怎样一种态度？这些问题对于中国建筑史学史研究颇值得一问。

事实上，刘敦桢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1931年11月11日，《时事新报》耻于东北军面对日军侵辽不战而逃，丧权辱国，提议国人以公意旌表两年前在中国政府试图收复主权的“中东路事件”中与苏联军队奋战、英勇殉国的东北军中将领韩光第将军。<sup>⑪</sup>此议得到社会各界迅速响应，并发展成为为韩募捐建立纪念塔的行动。11月20日，30位中央大学教师捐款45元，其中刘与建筑系同仁卢树森、刘福泰各捐2元<sup>⑫</sup>，由此可见他支持抗日的明确立场。

但是，相对于那些以激烈的请愿和示威行动抗议的师生，刘敦桢对日本侵华和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态度更为冷静和理智。这一态度与当时中国政界、民间、知识界以及学界在对日问题上的一种务实和理性主张相一致，也与傅斯年所表达的“废业则罪过更大”的认识不谋而合。

在政界，因9月28日学生在请愿未果的情况下冲进外交部并痛殴外长王正廷，为防止学生运动失控，身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当日接见请愿学生，希望他们“应用冷静的头脑，热烈的血，以应付国难，如果浮躁气太甚，不过加增国耻而已”。<sup>⑬</sup>国民党粤系元老胡汉民在党内事务方面与蒋介石龃龉颇多，并曾引发国民党“宁粤之争”。但此时对于学生运动，他也表达了与蒋相似的看法。10月16日，胡在上海对时局发表意见，希望青年成为国民之前锋，平时要注意“养力”，勿轻易“使气”。他说：“上海学生，过去参加各种救国运动，极具优良之成绩，当此国难临头之际，自应本‘为民前锋’之精神，继续努力。惟所谓运动，应多多注意‘力’的

准备，毋专作‘气’的发泄，因气仅能鼓动于一时，而力则能维持于永久。故极盼望各学生，能努力养成组织有系统的‘力量’，为外交之后盾。”<sup>⑭</sup>

在民间，10月4日，一向坚持“无偏无党”和“独立之精神”办报原则的《申报》发表了题为《抗日救国运动中一般国民之责任》的时评，呼吁民众从自身做起。作者说：“今日之事，惟有举国上下，同心一德，咬紧牙关，忍住痛泪，长保奋斗之精神，长持方升之朝气，卧薪尝胆，生聚教训，结束过去怯懦因循，懒惰衰老耻辱之历史，庶足以开辟我国家民族广坦光明崭新之前途。吾人以为，在今日情形之下，我举国国民都应：（一）认清自己之力量。……（二）先求诸己，次乃责人。……（三）利用家庭亲友各种关系，以小组组织之形式，互相监勉。……”关于第二点，作者特别说：“国势危迫，祸因不种于一朝，责任尤不在于一人。我举国人民，都为恶因之播种者，对今日之祸变，即都应直接负责。进一步言，祸变已发，即应急谋补救。图谋补救，先求诸我，次乃责人。亦惟己先尽责，乃能责人。若徒诿过于人，责善于人，满腹牢骚，中朝怒詈，于国何裨？”作者最后呼吁：“假使人人能持牺牲之决心，作艰苦之奋斗，不谈空言，切实负责，合四万万人之伟力，我固何有于日寇，何有于目前之艰难？”<sup>⑮</sup>

在知识界，身为中国左翼联盟作家旗帜的鲁迅在1931年11月20日为《北斗》杂志撰写了杂文《新的“女将”》，讽刺“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一些抗战宣传的游戏化做法。当时有些画报一向热衷用女性形象吸引读者，经常宣传女校皇后和社会名媛，此时突然转向展示“白长衫的看护服”和“戎装的女士们”。对此鲁迅批评说：谁也没有看见侵华的日军之中看护队的照片，其作战部队里也没有女人，“这是因为日本人是做事是做事，做戏是做戏，决不混合起来的缘故”<sup>⑯</sup>。当代文学、文学批评与文化史学者王彬彬认为，鲁迅是以此为例，进一步阐明他的主张，即凡事都当作游戏的中国人应该学习日本人的

认真精神；一个人民遇事极不认真的国家受到一个讲求认真的民族的侵略，那差距便不仅表现在军事力量上。<sup>⑮</sup>

在学术界，时任辅仁大学校长、北平大学教授和中国营造学社“评议”的陈垣表现出与鲁迅相似的态度。在其学术生涯中，陈一直致力于与外国学者一争高下，要“努力把汉学中心的地位从外国夺回中国”。<sup>⑯</sup>1935年，日军策划旨在进一步蚕食中国的“华北事变”，11月下旬在北平朝阳门制造紧张局面。对此学生们问陈对于时局的看法，陈答：

“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的地位是从各方面的成就累积的。北平市商会主席到日本去观光，人家特别派了几位商业上的领袖人物来招待。倾谈之下，我们的商人什么都不明白，连谈话的资格都不够。像这样凭什么去和人竞争？凭什么能使人尊重？我们必须从各个方面就着各个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我们的军人要比人家的军人好，我们的商人要比人家（的）商人好，我们的学生要比别人家的学生好。我们是干史学的，就当处处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sup>⑰</sup>

刘敦楨与鲁迅同样曾留学日本，此时他就是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学习日本人的认真精神。他通过翻译和补注日本学者的论文，向世人表明一名中国学者在这一特殊时期的态度，这就是对于自己专业领域的坚守。他也在像陈垣一样，就着自己所干的建筑史研究，“努力和人家比”。

1932年3月瞿兑之所写《旧京发现岐阳王世家文物纪事》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卷第1期发表。<sup>⑱</sup>时朱启钤因注意搜求近代建筑之实证，因而注意于故家文献。他在北平访得明开国功臣岐阳王李文忠第二十一世孙，并获其委托整理家藏各种遗物。瞿文即是对这些文物的文字简介，其中包括李氏祖莹图。这一信息当引起了刘敦楨的重视。当年4月，当中国社会尚未摆脱中日淞沪之战的恐惧与焦虑，中央大学也依旧处于动荡和不安之时，刘依然保持平静，与同事刘福泰、张至刚一起“再度”探访位于南京钟山阴的李文忠

墓，并在之后撰写了调查记，对照《明史》卷六十“礼志”有关功臣墓碑、石象生和坟墙形制的规定，并对比附近的徐达和常遇春等勋臣墓，对李文忠墓的设计进行了分析。值得注意的是，他以前评价明长陵和智化寺装饰艺术时曾采用过的“雄伟”标准来衡量该墓碑碑顶的雕刻，说它“龙、云萦绕，颇工整，唯龙身秀削，无雄伟气概，视同时北部诸碑，不逮远矣。”<sup>⑲</sup>

## 七、入职学社

因“九·一八事变”而引发的抗议示威活动持续不断，直至12月17日各地3万余名学生到南京大游行，捣毁中央日报社，首都卫戍司令部镇压，一名学生死亡，次日南京各校提前放寒假。虽然学潮暂时平息，但中央大学并未因此而安定。首先是因江苏教育经费管理处欠款导致学校经费困难，中大教师团体不得不向行政院、教育部、财政部以及江苏教育经费管理处严重交涉<sup>⑳</sup>；后又因学生反对，教育部提出的校长人选一再更变，是为中大历史上的“易长风波”。1932年6月29日行政院不得已议决暂行解散中央大学，要求“所有教职员应重行聘任，学生应重行甄别”<sup>㉑</sup>。在这一背景下，刘敦楨离开了任教4年的南京，在秋天<sup>㉒</sup>加入北平中国营造学社，赴任他在当年6月就已经得到的“文献主任”一职，正式开始其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生涯。他同时带给营造学社一批书籍，其中有北魏杨衒之所撰《洛阳伽蓝记》，北宋王溥所编《五代会要》，南宋张敦颐所编《六朝事迹编类》，南宋徐天麟所编《西汉会要》和《东汉会要》，清赵翼所撰《廿二史札记》。此外还有《春明梦余录》《日下旧闻考》《十一朝东华录》三部有关明清北京历史的大型文献。<sup>㉓</sup>

另据《时事新报》报道，1932年8月底刘敦楨曾作为全国拒毒代表大会的禁烟设计委员会委员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第一届全国大会<sup>㉔</sup>，所以他到达北平的具体时间当为此后，即9月初。

面对“九·一八事变”及其之后的日

本进逼，中国营造学社成员们也不无反应。原文献主任阚铎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与政界关系较深，在学社也多负责与日本交往事务，事变发生后的第二个月他就辞职出任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之后担任了伪满洲国奉天铁路管理局局长兼四洮铁路管理局局长。参校林徽因则对日本侵略充满愤慨，她在1932年6月14日致胡适的信中说：“国难期中大家没有心绪，沪战烈时更谈不到文章”。在结尾，她又说：“思成又跑路去，这次又是一个宋初木建——在宝坻县——比蓟州独乐寺或能更早。这种工作在国内甚少人注意关心，我们单等他的测绘详图和报告印出来时吓日本鬼子一下痛快痛快，省得他们目中无人，以为中国好欺侮。”<sup>㉕</sup>社长朱启钤虽已年届花甲，也不辞年迈，在1933年2月加入了支持东北军在热河抗战的东北热河后援协会，并担任常务理事<sup>㉖</sup>；他还在1938年日本占据北平之后以年老为由不再担任中央公园董事委员会会长。<sup>㉗</sup>

正式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之后，刘敦楨也以自己的行动表达对于日本侵略的担忧和对于国民政府软弱政策的不满。这年10月1日，位于天安门内的历史博物馆举办明代倭寇史料展览，有记者说：“值兹国难方殷，该馆此项展览，其意义之重大，自不待言，非徒供玩赏而已也。”<sup>㉘</sup>展览的参观者络绎不绝，刘提供的一件展品格外引人注目。据《华北日报》报道：“寄陈物品参加展览者亦有多起，其中最要者，为刘士能君寄赠之明神宗册封倭强藩丰臣秀吉为国王谕命影帧。”<sup>㉙</sup>（图9）1592—1598年，日本丰臣秀吉建立的武家政权侵略朝鲜，朝联合大明抵抗，史称“（万历）朝鲜之役”，期间明军伤亡惨重。刘敦楨提供的谕命影帧即为1595年万历皇帝为停战议和、册封秀吉的诏书影印件。秀吉接受了册封，但短暂撤军后又于1597年再次侵朝，敌我双方互有胜负，直至1598年9月秀吉病逝后日军陆续撤退，大明与朝鲜才获得惨胜。前往册封秀吉的大明正使李宗城是岐阳王李文忠的十世孙，此事在瞿兑之《旧京发现岐阳王世家文物纪事》

一文中有所记。刘敦桢曾撰《岐阳王墓调查报告》，或许因此注意到万历帝册封日酋的诰命。该诏书原件今藏日本大阪博物馆。据《华北日报》报道：刘辗转获得诏书影印件，赠送历史博物馆；后者将其装潢悬陈，并将展览结束日期从初定的10月12日延至10月底。记者说，从诏书可见“当时倭情之狡诈，明廷之颠预”。因展览中尚有明代中期戚继光抗倭史料，记者又感慨道：“设无戚继光辈诉诸武力，变换正无了期也。”<sup>⑧</sup>换言之，记者认为这件展品令人酌古斟今，反思政府的软弱无能，呼唤忠臣良将和提倡积极军事主张。由此可见，与之前为韩光第将军纪念碑捐款的行为一样，刘此时展出这件历史材料表明，对于时局和当局者，他与主张抗日的中国大众的普遍看法相似。不过他的做法并非公开抗议，而是借古喻今，即以一名史家的视角，提醒国人以史为鉴。

1932年9月，就在刘敦桢到社不久，他的新同事梁思成也翻译并发表了日本学者田边泰所著的《大唐五山诸塔图考》。这篇文章认为《大唐五山诸塔图》“包含中国五山及其他平面，建筑图案，构造，佛具及礼仪規制等，故为研究现在几将湮灭之南宋禅宗建筑之绝好资料”。在“译者按”中，梁思成认为它与《营造法式》“两者较鉴，互相解释发明处颇多”。其中有关“插拱”——即今天学界所称的“大佛样”斗拱做法，与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德国学者艾克(Gustav Ecke, 1896—1971)<sup>⑨</sup>调查的福建宋代遗迹颇多一致，“则日本东

大寺中门之插拱，传自我国，又获一有力之证明”<sup>⑩</sup>。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按语中，梁思成尊称当时仅为早稻田大学建筑助教授的田边为“先生”。

虽然我们并不能将“九·一八事变”之后，阐释、林徽因和朱启铃等营造学社成员的态度简单地归纳为“亲日”和“仇日”，但却可以肯定地说，刘敦桢和梁思成二人在他们的工作中所表达的态度是“知日”，即通过了解和学习日本学术，从而达到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和赶超外国学者的目的。而梁思成还有意揭示古代中国建筑对于日本的影响，从而激发国人的自豪感。

## 八、研发新刃

很显然，梁思成和刘敦桢加入营造学社之后，学社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巨大改观。首先是引入了考古类型学的视觉分析方法，充分利用实物或视觉材料进行研究；第二是引入佛教美术知识；第三是在传统文献学的基础上进行物文互证；此外还有对于建筑形制的关注，以及对于中国建筑研究领域或议题的拓展。前三者是梁刘共同努力的结果，后者则更多是刘的独到贡献。

### 1. 考古类型学的视觉分析方法

借助于伯希和《敦煌图录》一书中所披露的敦煌石窟壁画，梁思成在1932年3月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卷第1期中发表了《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一文。在文中，他从壁画的视觉材料中归纳出唐代建筑的平面配置、建筑种类，以及材料、色彩、柱、斗拱、屋顶、门窗、栏杆、天花和雕饰等结构特征。这项研究充分展示了梁的形式分析能力。这一能力的培养无疑得益于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受到的学院派建筑教育和在哈佛大学受到的美术史教育，以及他对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所体现的方法论的了解。

而刘敦桢能很好地掌握形式分析的方法

法，则当是得益于他在日本受到的建筑史教育和他对日本学者著作的仔细研读。翻译和注释滨田耕作和田边泰的著作对于刘的建筑史研究至少有两个意义：一是使他了解到日本以美术史的形式分析为基础的建筑考古学方法；二是帮助他了解到日本和欧洲一些重要的东洋学和汉学学者有关中国建筑调查和研究的成果。如他的注释不仅涉及滨田、田边两位作者的研究，还提到伊东忠太、关野贞和常盘大定，以及色伽兰(Victor Segalen, 1878—1919, 又译谢阁兰)和伯希和等西方学者的工作。通过他们的著作，他了解到许多重要的建筑实物。这些著作使他得以借助图像资料了解自己尚未考察过的地区的建筑情况<sup>⑪</sup>，也成为他和营造学社同仁日后实地考察的导览<sup>⑫</sup>。

滨田耕作和田边泰的著作都体现了建筑考古学的工作方法，即将美术史研究的形式分析，用于分析建筑物的风格特征和演变脉络，进而断代并追踪其背后的文化关联与影响。法隆寺是日本最古老的木构建筑。围绕着它的建造时间、设计特点和重建历史的讨论，曾经极大地促进了日本建筑史研究方法的发展。1898年伊东忠太在他的博士论文《法隆寺建筑论》中分析了该寺建筑的伽蓝配置、建筑构架、细部构造，其中细部包括鱼肚形[按：日文原文为“胴张り”，《刘敦桢全集》(以下称《全集》)改译为“梭形”]之柱、座斗(按：《全集》改译为“枌斗”)下之皿板、云形拱及云形十八斗(按：《全集》改译为“云形交互斗”)、凹曲线之拱端、卍字勾栏，及人字形铺间斗科(按：原文为“人字形の墓股”，《全集》改译为“人字形补间铺作”)等(图10)。作为结论，他认为该寺建筑体现了飞鸟时期的式样。滨田认同伊东的判断，又以考古学为根据，对伊东的看法做了进一步论证。他首先将伊东归纳出的法隆寺建筑造型特点与朝鲜半岛高句丽时代和新罗时代的遗迹进行对比，进而再追踪这些细节在中国北魏的云冈、龙门、天龙山等石窟，以及嵩山会善寺净藏禅师塔中所具有的对应做法。他得出结论说：



图9：刘敦桢为“明代倭寇史料展览”提供《明神宗册封倭藩藩臣秀吉为国王诰命》影帧的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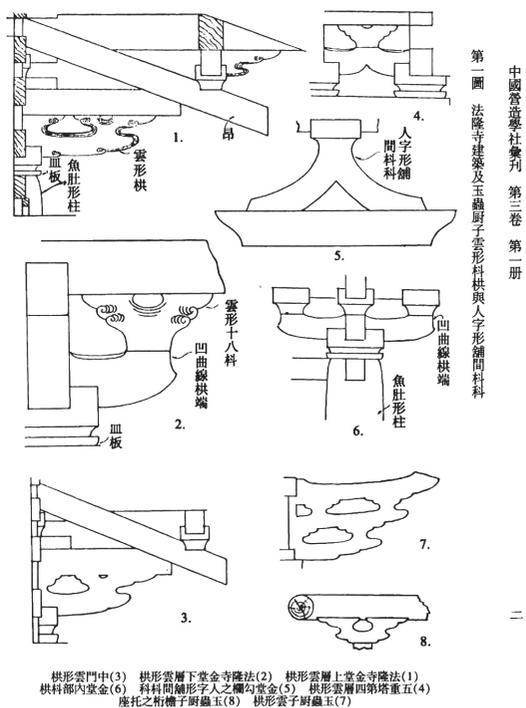


图10: 伊东忠太《法隆寺建筑论》对法隆寺建筑细部特异之点的搜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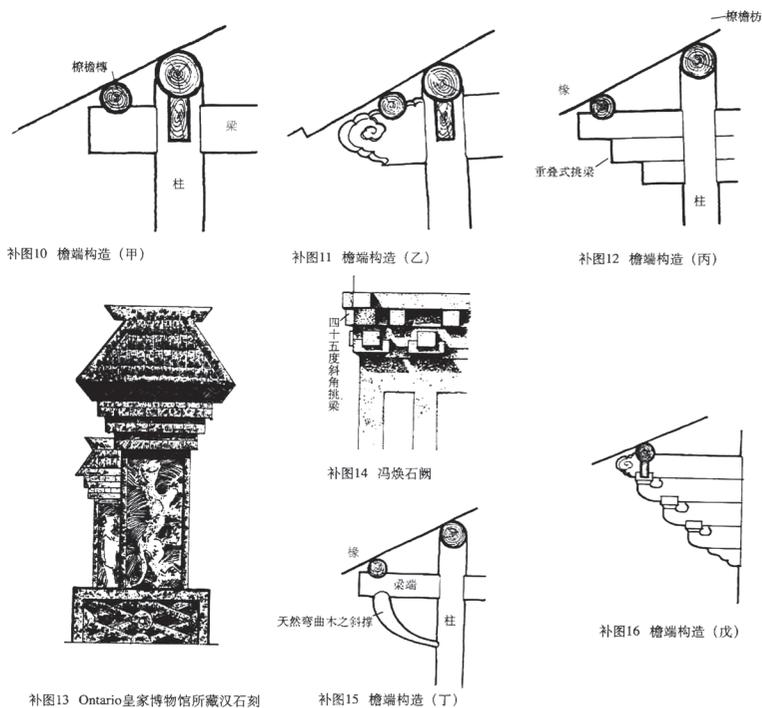


图11: 刘敦楨从结构原理角度对斗拱演变逻辑的分析

“日本天平时代至白凤初期之法隆寺式样，适与天龙山北齐诸窟属于同一系统，颇为美术史中重要之事实也。”<sup>⑤</sup>

滨田进一步上溯六朝以前建筑，试图通过分析石刻、石阙和明器等汉代遗物，探寻法隆寺式样之来源。他发现法隆寺拱身颇高的特点在雅安高颐墓阙和绵阳平阳府君阙也可见到，于是认为法隆寺同为“古式”，与奈良朝的拱“上缘削曲，仅存内缘曲线之余意”甚为不同，“俟至后代，则拱之上缘，纯用水平直线”，体现“与时代具为推移”。他更发现，一座汉明器望楼采用了云形拱，于是认为它“较四川诸阙更与法隆寺式样接近”。田边泰认为，由此滨田耕作证明了法隆寺建筑式样的渊源，并确定了这种样式在日本艺术史中的位置。<sup>⑥</sup>

滨田耕作在文章的最后还勾勒了斗拱的发展脉络：由“曲线较多之式样，渐次进为直线较多之式样”，“其后因增加建筑物之庄严华丽，乃重叠层累，有四铺作至八铺作之构造，同时铺（按：《全集》改‘铺’为‘补’）间斗拱，渐趋密接”。

滨田比刘敦楨年长16岁。刘对这位日本前辈学者论文的“注”首先是注释，即他以注释的方式帮助中国读者了解滨田

论文中提到的日本和中国历史时期，以及中、日和印度建筑名词与实物、石窟寺、石室、石阙等相关信息，并补充了中国文献中的相关记载。此外，刘的“注”也是一种审辩性的评注：一是评判滨田的观点；二是提出自己的见解。如他根据《魏书·释老记》认为云冈石窟应开凿于北魏和平年间（460—465年），而不是滨田认为的“殆成于北魏孝文帝太和间（按：477—499年），及其以后时期”，所以他说滨田“不无小误”（补注13）。他又指出滨田将云冈石窟一处一斗六升斗科视为瓜拱万拱重叠之状，并“谓与法隆寺云形拱同一意义”的说法“颇似牵强”（补注15）。

针对滨田从形式分析的角度梳理的斗拱演变线索，刘敦楨又从结构原理的角度论述了斗拱演变的逻辑，即出檐的需要导致拱的产生，稳定檐榑的需要导致替木产生，枅斗导致泥道拱和柱头枋产生，华拱和昂的出现有助于支持檐端的重量，以及计心造万拱、厢拱（按：《全集》改清式名称“万拱”和“厢拱”为宋式名称“慢拱”和“令拱”）的出现有助于加强邻柱之上斗拱间的联络（图11）。

在《“玉虫厨子”之建筑价值》一文中，

田边认为玉虫厨子上部台基束腰内置短柱的做法是工匠自由之为。刘敦楨在注释中质疑了这一看法。他试图以自己调查过的南京栖霞寺舍利塔作为证据，证明这种做法是本于中国的隋唐建筑。很显然，他对滨田和田边二文的注释是与他们的对话，并试图在审辩的基础上对这两位日本同行有所超越。但他并不固执。1936年他意识到栖霞寺舍利塔实为唐宋间风格，而不是自己先前认为的隋唐风格，于是在该年冬至又在自己的文章中加了眉批，承认日本学者的论断“至为精确”，并说“深悔一隅之见，影响读者，谨此正谬”。<sup>⑦</sup>

与梁思成借助敦煌壁画研究唐代建筑相似，刘敦楨在自己的研究中也使用过绘画材料。在《刘士能论城墙角楼书》中，他指出，由于去元未久，故四隅角楼之制在明成祖营造的北都皇城得以延续并被清代继承。值得注意的是，除宋《北盟会编》、元《辍耕录》和明《故宫遗录》等文字史料之外，刘还引用了明代大收藏家项元汴的天籁阁曾经收藏过的宋画《黄鹤楼图》论证紫禁城角楼三檐十字脊造型的渊源（图12）。他的这一见解亦见于乐嘉藻一年后出版的《中国建筑史》并被乐著图示（图13）。<sup>⑧</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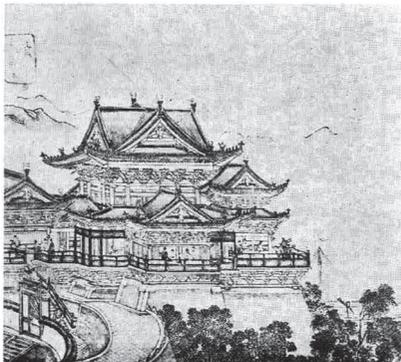


图12: 宋画《黄鹤楼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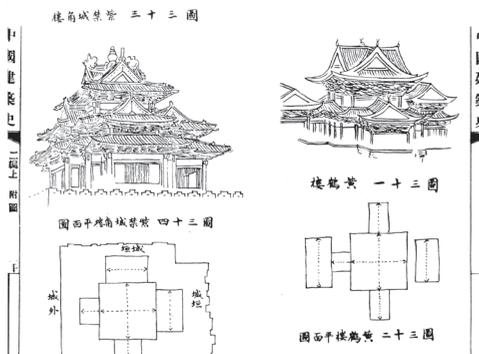


图13: 黄鹤楼与紫禁城角楼造型对比

## 2. 佛教美术知识

日本学者的著作同时帮助刘敦桢拓宽了有关佛教美术的知识，为今后调研佛寺、石窟奠定了基础。在《佛教对中国建筑之影响》一文中刘已概述了佛教东来之后对于中国建筑装饰的影响。与前述他谈到的其他中国建筑装饰母题一样，这篇文章中有关卷草 (Acanthus) / 忍冬草等外来纹样的介绍亦见于伊东忠太的《中国建筑史》。而他对滨田耕作《法隆寺与汉、六朝建筑式样之关系》一文的补注则有多处引用了关野贞对云冈和龙门石窟的调查。结合文中其他关于塔、寺、石窟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此时他已经通过阅读日本东方学著作开始关注佛教美术，并把相关认识用于建筑史研究。在《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一文中，他注意到转轮藏装饰上象征善的金翅鸟 (Garuda) 和象征恶的龙女 (Naga) 等装饰细部。在1933年3月他还曾就六朝之塔等问题回复德国学者艾克，结合文献和中日实物对佛塔建筑的华化过程和结构特点做了详细介绍。<sup>⑤</sup>这些工作表明他此时对佛教美术，甚至印度美术已颇有了解。而几乎与刘同时，梁思成也在研读佛教美术。除了他在《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一文借助了伯希和、斯坦因等西方学者关于敦煌石窟的调查报告，以及日本学者有关中国建筑的著作，梁从任教东北大学时就开始编著的《中国雕塑史》一书中有关北魏至宋佛像的讨论还有大量内容是译自瑞典学者喜龙仁 (Oswald Sirén, 1879—1966) 的《五至十四世纪的中国雕塑》一书。<sup>⑥</sup>

## 3. 文献学基础上的物文互证

在文献学研究方面，刘敦桢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校勘学方法、名物学方法和史料类纂方法。如他曾与朱启钤共同校注《永乐大典》中的《梓人遗制》<sup>⑦</sup>，并协助朱编纂《哲匠录》<sup>⑧</sup>，还与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及版本目录学家谢国桢 (字刚主, 1901—1982) 和营造学社社员单士元 (1907—1998) 合作校勘故宫抄本《营造法式》，发现该书“卷四·大木作”仍保存了其他诸本缺失的“慢拱第五”这条“甚足珍异”的文字<sup>⑨</sup>。此外，他还独自校勘多种版本的《鲁班经》<sup>⑩</sup>。而《佛教对于中国建筑之影响》一文中有关“阶台”“础石”“柱”和“梁”，以及《大壮室笔记》中有关“轩”等中国古代建筑名词的解释则源于传统名物学。

通过文献学研究，刘敦桢获得了大量中国古代建筑史料。其中包括《大壮室笔记》中搜集的汉代建筑史料，如“两汉第宅”“两汉官署”“两汉道路”“汉长安城及未央宫”，以及“西汉陵寝”和“东汉陵寝”等。不仅如此，他还将文献研究扩展到清代桥工专书《万年桥志》<sup>⑪</sup>以及清代内务府档案中的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sup>⑫</sup>

不过相比于校勘、名物解释和类纂等传统文献学方法，刘敦桢更具现代意义的尝试是与梁思成一道发展了将文献与实物进行互证的中国建筑和营造学研究方法。例如，在讨论1931年夏天测绘的明长陵石牌坊的设计时，他参考了社友关祖章 (1894—1966) 收藏并寄存于营造学社的

《牌楼算例》这本“工匠薪火传授之底本”。该书对五间牌楼面阔比例的规定是：“先定通面阔若干，用二百五十分除之，得分若干。用五十六分得明间。五十一分半得次间。四十五分半得梢间”。刘结合测绘数据发现，长陵石牌坊“明间五十六分半，次间五十一分，梢间四十五分七，与《牌楼算例》所规定者大体类似”。他因此得出判断，这一现象“足证明以来牌楼比例，无显著之变化”<sup>⑬</sup>。与梁对《清式营造则例》和《营造算例》的整理相似，刘也结合调查所见其他牌楼实物材料，对这本工匠手册的文字进行了整理和图解，并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发表。<sup>⑭</sup>他整理的文本在1934年5月又作为一章与上述梁整理的两部文本合并，以《清式营造则例》为题再版。<sup>⑮</sup>

1932年春梁思成在对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和山门的研究中充分参考了《营造法式》。而刘敦桢在同时期对北平智化寺如来殿的研究中则同时参考了这部宋代匠作专书和清代的《工程做法》。他得出结论：“如来殿之外形虽大体与清代一致，其细部手法，尽多特异之点。就中与清式异者每不乏与宋式类似，则明代北平建筑，虽受金、元异族文化影响，仍未尽忘旧时矩矱，故宋、明之间，不能谓为毫无因袭相承之关系，此殿亦不失为过渡时代之例也。”<sup>⑯</sup>

## 4. 对建筑形制的关注

与梁思成聚焦于解读清《工程做法》和宋《营造法式》不同，刘敦桢继续发展了自己1931年12月在角楼研究中采用的方法。《刘士能论城墙角楼书》一文虽短，但它所体现的刘敦桢的两个方法论尝试值得后人特别注意：第一是通过发掘历史文献寻找其中有关建筑的历史信息，对此上文已经有所介绍；第二则是通过发现角楼这一特殊建筑类型的历史延续性，揭示其所具有的形制——形式制度——的意义。后者在中国传统的经学和礼制研究中早有体现。如东汉古文经学家郑玄所注《周礼·秋官·朝士职》中就有关于“三朝”

和“五门”的解释，之后又有唐代贾公彦所著《周礼注疏》、五代经学家聂崇义所著《三礼图集注》、南宋叶时著《礼经会元》、明代李如圭所著《仪礼释官》等诸多涉及宫室制度的经解。<sup>⑤</sup>清代以来，有关宫室制度的经学研究除上文提到的焦循和王国维的著作之外，还有江永所著《乡党图考·宫室》，戴震所著《考工记图》《明堂考》和《三朝三门考》，以及闾铎曾为之做“校记”的任启运所著《宫室考》<sup>⑥</sup>等。朱启铃在1929年就曾强调“古人宫室制度之见于经史百家者，皆宜取证”<sup>⑦</sup>，之后他与闾铎合作完成的《元大都宫苑图考》就是这一想法的实践。朱还曾拟编《营造丛刊》，“于礼经宫室，特设一门，而以明堂、庙寝、宫、室、门等，为其子目，轮輿附焉”<sup>⑧</sup>。伊东忠太在《中国建筑史》有关周代宫室的讨论中则引用了《周礼》的记述及聂崇义《三礼图集注》中的“宫寝”图，显示出他自认为的日本学者在文献方面较之西方学者的优势。

但刘敦桢则对经学与礼制研究的应用做了更大扩展，突出表现在他1932年9月发表的《大壮室笔记》中有关汉代第宅、宫殿和陵寝的讨论。<sup>⑨</sup>如他在笔记开篇就指出自来治礼者对明堂庙寝之制、天子宫室三门或五门、明堂五室或九室等制度莫衷一是的状况。这表明当时他对相关诸家经解已有所研习。之后他选择诸家所说独少抵触的士大夫门寝规制为对象，并将两汉典籍中所描写的起居活动与《仪礼》相对比，指出“两汉堂室，犹存周制”。他还发现汉朝诸宫皆有前殿，一如《史记》所载阿房宫前殿之例，但独无《礼经》（按：亦即《仪礼》）规定的外朝、治朝和燕朝之法。他由此判断，楚汉之际，天下未定，六经未出，古制荒湮，萧何营造前殿已遭高祖责难，故必无余力再更多追摹旧法，且高祖素恶儒生，而萧何为秦故吏，匠目习阿房，所以“当时经营，或以秦宫为范”，是为“秦制”。直至隋文帝另营长安，方追绍《礼经》，刻意复“周制”之古，影响波及唐宋以及明清宫室。对于这项研究，当代杰出的建筑史家傅嘉年曾给予充分肯

定，他说：“《大壮室笔记》综合早期文献，从建筑学的角度研究两汉时期各类型建筑的特点及发展演进过程，并把它们和经史中反映出的古代社会情况、典章制度结合起来加以论证，迄今仍是研究两汉建筑的必读之作。”傅同时高度评价刘在1949年发表的《六朝时期之东、西堂》，他说：“在《六朝时期东、西堂》一文中，刘敦桢先生以建筑师特有的敏锐，从前人读史均视而不见的大量史料中考证出东西堂这种自三国至南北朝末年宫廷主殿的一种特殊组合形式，理清了中国古代宫殿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sup>⑩</sup>

事实上刘敦桢关于中国古代建筑形制的探讨，不仅仅见于《大壮室笔记》和《六朝之东、西堂》二文对汉及六朝宫室之制，以及汉代宗庙之制和陵寝之制的关注，而且还见于他在北平智化寺研究中对佛寺建筑“伽蓝七堂”之制的关注<sup>⑪</sup>，在明长陵和易县清西陵研究中对明清陵寝制度的关注<sup>⑫</sup>，以及前文所述他在南京岐阳王墓研究中对明代异姓王墓规制及其与唐宋陵制关系的关注。此外，在由刘敦桢主编，1964年完成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一书中有关明清故宫的主要建筑与“左祖右社”“前朝后寝”“三朝”“五门”等礼制规定之间关系的讨论，以及对天坛建筑所体现的古代宇宙观的讨论，更与梁思成《中国建筑史》一书中以平面布局和结构方式为主的相关讨论形成了明显对比。<sup>⑬</sup>这些研究既与传统经学和礼制研究对营国制度、宫室制度、明堂之制和门制等建筑形制的研究有关<sup>⑭</sup>，又对之有所拓展，且因为能与实物图文互证而使形制研究得到历史化。

## 5. 对于中国建筑研究领域的拓展

刘敦桢的另一个贡献是拓展了中国建筑史研究的范畴。他的研究不仅包括宫室、寺庙、塔幢、陵墓、牌坊、园林等诸类建筑，还包括琉璃制作技术<sup>⑮</sup>与造桥技术，特别是石轴柱桥技术。<sup>⑯</sup>朱启铃曾说：“考工之学，所涵至广。启铃昔以‘营造’名吾社，意以宫室之构筑为主，旁及范金合土之艺

事。”他特别强调，沟防之工，也是《考工记》中匠人一职，“水政之在吾国，精微浩博，……治水专书，于名物制作，工料计算，言之最核。由此以推及其他工事，常可互相渗发”。基于这一认识，朱在《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一文中明确提出“沟通儒匠、濬发智巧”为学社第一使命。<sup>⑰</sup>他本人还曾发起成立古瓦研究会<sup>⑱</sup>、征求营造佚存图籍<sup>⑲</sup>，并广泛搜集沟渠类专书<sup>⑳</sup>。刘敦桢研究范围之广，表明他对中国营造学社使命的认识与朱启铃颇为一致。1940年代和1950年代，他又将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展到都市、住宅和家具，更在1959年以印度建筑为起点，提出了“东方建筑”的研究目标。<sup>㉑</sup>

## 结语

至此，笔者在本文开头所提的几个问题终于有了较为清晰的答案。第一，刘敦桢的中国建筑史研究起步于何时？——这个时间可以追溯到他在1926年回到苏州并在苏州工专任教和与当地营造业领袖姚承祖结识之时。有证据显示他曾学习过日本建筑，在1927年时已研读了《营造法式》，并在1928年春天之前就已对伊东忠太和关野贞等日本学者有关中国建筑的研究有所了解。他也在此时效法日本东洋学的方法开始进行历史建筑的实地考察。他在日本所受的教育亦当有助于培养他对于建筑形式的敏感和对于结构原理的自觉。通过对视觉效果和结构性能的比较分析，他在1929年初次考察北平紫禁城宫殿之后就做出了褒明贬清的建筑审美评判。

第二，刘敦桢如何与中国营造学社结缘？——1929年夏他曾带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班学生北行参观和考察，1930年6月他发表了《北平清宫三殿参观记》。极有可能他的工作因此引起了朱启铃的重视，使他在当年12月被接纳为学社的“校理”。

1931年夏刘敦桢带领中央大学师生进行第二次北行考察，期间他们参观了营造学社，并与学社合作测绘了北平智化寺，还请学社为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制作古代

建筑模型和绘制彩画图样。回到南京之后，他通过书信继续与学社保持联系，其中关于城墙和宫城角楼形制的讨论充分体现了他的古文献修养和对视觉材料的敏锐。这些合作与交流使得学社得以了解他在中国建筑研究方面的不凡造诣，这应该就是促使朱启钤在1932年3月做出聘请他担任学社“文献主任”一职决定的原因。

第三，刘敦桢的中国建筑研究与他所处的时代有何关联？——他在1928年发表的第一篇建筑学术论文《佛教对于中国建筑之影响》是对中国文化同化外来文化能力的肯定，体现了经历过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学界对“全盘西化”主张的反思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积极态度。1929—1931年期间他关注明代建筑，并形成了褒明贬清的建筑审美评判，这一点与当时首都南京的建设对“中国固有式”风格的提倡不无关系。如果说梁思成是以“豪劲”风格的唐辽和宋初建筑作为中国建筑文艺复兴的起点，刘敦桢则是推崇最后一个汉族统治的王朝在建筑上所具有的“雄健”气质。“九·一八事变”之后，刘敦桢一边通过捐款和提供史料表达自己支持抗日的立场，一边在南京充斥着抗议示威活动的环境中先后翻译了三篇日本学者的论文。这是一位中国史家对于本职的坚守。与梁思成在同一时期翻译日本学者论文一样，他们的工作中所表达了一种“知日”的态度，即通过了解和学习日本学术，从而达到壮大自己的研究和赶超日本学者的目的。

第四，更重要的问题是，刘敦桢对中国营造学社研究范式的形成，乃至对中国建筑研究发展的特殊贡献何在？——如果说1928年发表的《佛教对于中国建筑之影响》一文是他第一篇中国建筑史研究论文，1931年底他做的几项重要工作和1932年发表的几篇论文则标志着他在研究方法上已趋于成熟并呈现出明显特色。具体表现在以下五点：①对实物造型与结构的分析；②对佛教美术的知悉；③在文献学基础上的物文互证；④对建筑形制的关注；⑤对于中国建筑研究领域或议题的拓展。前三

者是他与梁思成研究方法相似之处，后二者则更多地体现了他的个人特色。其中①和②当是日本建筑教育的影响和刘对日本东洋学学者建筑研究方法的借鉴；③是基于中国史学研究的传统，同时体现了20世纪中国史学革命的先驱者王国维提出的以得之于地下的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对当时中国建筑研究的影响<sup>⑥</sup>；④是对传统经史之学有关礼制制度研究的发展；⑤则要求超越来自西方的“建筑学”概念，去理解更大的中国营造学甚至“考工”传统。其中对于形制的关注使他在1949年之后更容易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史观，探讨使用方式、文化和经济等因素对不同类型建筑的影响。<sup>⑦</sup>

简言之，在1932年秋天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之前，刘敦桢的中国建筑研究已经深有积累，方法也已颇为成熟。与梁思成相比较，二人同样精于以视觉分析为基础的建筑考古，长于佛教美术，重视视觉材料，更自觉于物文互证。但有所区别的是，梁以古代建筑法式为研究核心，而刘以传统营造法为关注对象；梁重视风格史和对应的结构发展脉络，而刘更关心不同建筑的类型与形制；梁善于用图展示建筑的设计及风格演变<sup>⑧</sup>，而刘更精于通过文献说明建筑和营造的文化和历史关联；梁的研究可以直接裨益于现代中国风格新建筑的创造，刘的研究则可以引发更为广泛的历史思考。概括而言，梁对于中国建筑风格和结构脉络的历史叙述如同一位“大木匠”建构的结构框架，刘对中国各类建筑和种种营造问题的探讨则如一位“瓦石匠”为这个框架砌筑了墙体和划分了空间。他们是20世纪中国建筑研究的绝代双骄，共同建立了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范式。

在梁、刘背后，则是胸怀探索中国营造学奥秘之大志，运筹帷幄，总理学社各项事务，知人善用且极具学术眼光的“都料匠”——总营造师——朱启钤。——首先，在中国一个现代转型、传统文化普遍遭到质疑的时代，他以一己之力成立中国营造学社，并以过人的见识和鲜有匹敌的社会影响力极大地提高了包括营造学在内

的中国考工之学在国学研究体系中的地位。之后，他又以现代学术机构的组织方式将学社的办社方式从私人研究团体变为社会性学术团体，不仅为中国建筑的研究争取得到更多社会资源，还扩大了学社的对外交流。更进一步，他以识珠慧眼，延聘梁思成和刘敦桢两位不世之材担当了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主持，并不遗余力地成就了他们的研究事业。不仅如此，与他管理才能同样杰出的还有他的学术见地。1930年2月16日，朱在《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中提出学社工作的三个向度。第一，“平面”上对于营造辞汇的整理、训释和图画以彰形式。第二，“纵剖”上梳理关于营造之史迹，“其以何因缘而成邪？出自何人之力邪？其创邪其因邪？其受影响何自邪？其遗留迄于何时，而后尽毁邪？其后有效之而继起者邪？其规模有尚存于后代者邪？……试思此于社会经济势力之推迁关系为何等邪？”第三，“横断”上探讨与其他文化之关系：“凡一种文化，绝非突然崛起而为一民族所私有。其左右前后，有相依倚者，有相因袭者，有相假贷者，有相缘饰者，纵横重叠，莫可穷诘，爰以演成繁复奇幻之观。”他说：“有纵断之法，以究时代之升降，有横断之法，以究地域之交通。综斯二者以观，而其全豹庶乎可窥矣。”<sup>⑨</sup>这一思想意在突破专业领域，将营造之学置于跨时代与跨地域，甚至跨民族的宏观文化语境中进行综合考察，至今不失其学术意义。

梁思成和刘敦桢以他们艰苦卓绝的工作将朱的设想付诸了行动并注入了自己的认识。他们二人与朱和学社的成员们一道，共同为中国建筑史的现代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他们开辟的中学、西洋学和东洋学相结合的研究道路今天依然没有过时，他们的业绩也将继续激励后来者不断奋进。

[致谢：2022年1月7日、2月18日和3月5日，笔者获邀参加了哈佛大学CamLab张晋维、闵嘉剑以及童明和张琴等学者组织的系列讲座《拾遗留痕——刘敦桢与营造学社》，有幸聆听士能前辈的哲嗣刘叙杰教授回忆先父并参与讨论。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即形成于这些讨论。在研究中笔者得到王莉慧、徐苏斌、包慕萍、周健民、陈平、费文明、姚颖、吴敏超、刘涤宇、刘江峰、

林慧等友人在资料方面的帮助。初稿完成后，除他们之外，更多同道给予了反馈意见，其中包括洪再新、张十庆、陈薇、李恭忠、阎亚宁、王明贤、罗圣庄、袁元、赵辰、卢永毅、李鸽、李海清、汪晓茜、沈响、白颖、贾亭立、李华、葛明、华正阳、张路峰、彭长歆、李军、贺西林、杨煦、黄庄巍、颜文成、李雨薇。对此笔者深表感谢！]

## 注释

⑩社员通讯：刘士能论城墙角楼书(1931年12月16日)[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1):179-180.

⑪滨田耕作著,刘敦桢译注.法隆寺与汉、六朝建筑式样之关系(1926年5月)[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1):1-60.

⑫田边泰著,刘敦桢译注.“玉虫厨子”之建筑价值(1931年12月)[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1):61-74.

⑬(日)关野贞著,吴鲁强译,刘敦桢译注.日本古代建筑物之保存[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2):101-123.

⑭北大示威游行发生冲突[N].申报,1931-12-6(8).

⑮傅斯年致王献唐信(1931年10月6日)[M]//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七).(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103.另参见:林磊.“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新史学的命运——以抗战时期的傅斯年为中心[J].中国文化研究,2017(4):28-40.

⑯84年前,蒋介石通过大公报得知“九·一八”事变[EB/OL].大公网,2015-9-18[2022-10-9].http://news.takungpao.com/mainland/focus/2015-09/3173735\_wap.html.

⑰国人应旌表蒋将军[N].时事新报,1931-11-11(2).

⑱建筑韩光第将军纪念碑捐款芳名[N].时事新报,1931-12-5(1).

⑲参见:沈成飞.蒋介石对“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运动的态度——兼论影响其处理方式的主客观因素[J].学术研究,2018(4):133-141.

⑳胡汪握手前各方要息[N].申报,1931-10-17(13).

㉑时评:抗日救国运动中一般国民之责任[N].申报,1931-10-4(9).

㉒冬华(鲁迅).新的“女将”(发表于1931年11月20日《北斗》第1卷第3期)[M]//鲁迅全集(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43-344.

㉓王彬彬.启蒙即救亡——“九·一八事变”后鲁迅关于抗日问题的社会批判[J].文艺研究,2020(7):61-69.

㉔陈智超.《元西域人华化考》导读[M]//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2.

㉕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陈垣先生[J].东方杂志,1944,40(7):51-53.

㉖瞿兑之.旧京发现岐阳王世家文物纪事[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1):115-122.

㉗刘敦桢.岐阳王墓调查记:岐阳世家文物图像册(1937年)[M]//刘敦桢全集(三).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114-115.

㉘中大教授会,限期发清该校欠费[N].民国日报,1932-1-23(4);中大员生赴镇(江)索欠[N].时事新报,1932-1-28(1).

㉙行政院今日命令,中央大学暂行解散[N].南京晚报,1932-6-29(2).

㉚刘敦桢《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的“引言”中有言“今秋来北”。

㉛本社自八月廿四日起至十二月底止受赠各界书报表列于左敬表谢悃[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4).

㉜全国拒毒代表大会电询顾主席公开烟禁[N].时事新报,1932-8-31(4).

㉝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9卷)[M].合肥:黄山书社,1994:387.

㉞东北热河后援会通电,请同胞输财救国,集中民众抗日力量,为前方战士后盾[N].时事新报,1933-3-3(3).按:东北热河后援协会于日军侵华的“热河事变”爆发之后的1933年2月16日成立,同年8月26日结束.常务理事除朱启铃外,还有前东北矿务局总办王正毅夫人及熊希龄、周作民、胡适、张伯苓、朱庆澜、蒋梦麟、丁文江等8位社会名人和学者。

㉟中央公园董事委员会改选正副会长[N].实报,1938-9-21(4).

㊱历史博物馆陈览明代倭寇史料[N].华北日报,1932-10-1(6).

㊲历史博物馆倭寇史料延期展览[N].华北日报,1932-10-20(6).

㊳历史博物馆倭寇史料延期展览[N].华北日报,1932-10-20(6).

㊴有关艾克的生平,可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Gustav\_Ecke.涂颖佳,徐苏斌,青木信夫.“天竺样”、维特鲁威、建构与营造学社:从艾克《亭式石塔》的写作看20世纪30年代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建筑的历程[J].建筑师,2022(5):19-38.

㊵田边泰著,梁思成译.大唐五山诸堂图考[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3):71-89.

㊶如刘敦桢在《牌楼算例》(《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4卷第1期,1933年3月,39-81页)一文中说:“斗拱结构,除用普通翘昂外,北海、圆明园等处牌楼,偶用如意斗拱。其出挑拱翘,斜列成四十五度,互相承托,无外拽瓜拱与外拽万拱二物。此类斗拱之起源,迄未明了,其分布状况,亦未经精密调查,仅知湘、鄂二省,用者较多,赣、闽、浙诸省次之,南京、西安亦偶见其踪迹。意者明代营造有征工制度,各地工匠,轮班供役,按年瓜代,此式遂随征工之制,流传故都,殊未可知。”此时他对中国建筑尚未做过地域如此广泛的考察,他有关鄂、赣、闽、西安等地建筑的了解必得自于图像材料。其中常盘大定和关野贞在1925—1927年出版的《支那佛教史迹》就有这许多省市建筑的图片。

㊷如梁思成、刘敦桢在1933年所写的《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4卷第3、4期,1934年6月,1-168页)在述及华严寺创建年代时曾提到常盘大定和关野贞合著的《支那佛教史迹》(1925—1931年),文中讨论的海会殿“蜀柱”最早见于伊东忠太所著《北清建筑调查报告及实测图》(《建筑杂志》,189期,1902年9月。感谢谢慕萍教授惠赠这份宝贵史料)。早在1931年12月,刘敦桢在对滨田耕作《法隆寺与汉、六朝建筑式样之关系》一文的“补注六”就曾介绍海会殿这一细节。另外,中国营造学社1939年8月至1940年2月进行的川、康地区考察记录了四川渠县冯煥墓阙、沈府君墓阙和赵氏阙,以及雅安高颐墓阙等实例。(参见:梁思成.西南建筑图说(一)[M]//

梁思成全集(三).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137-251;刘敦桢.川、康古建筑调查日记;川、康之汉阙[M]//刘敦桢全集(三).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265-324,325-333.)这些汉代遗存最早由法国学者色伽兰(Victor Segalen)发现,并发表于他与Gilbert de Voisins和Jean Lartigue合著的《Mission Archeologique en Chine》(1914年)。滨田耕作所著《法隆寺与汉、六朝建筑式样之关系》一文中曾引用色伽兰所拍这些建筑的照片。所以刘敦桢早在1931年12月翻译滨田论文时就当知悉了这些位于四川的汉代石阙。他在1939年12月27日有关渠县诸阙的考察日记中说:“诸阙中以冯煥阙之比例、雕饰最为无懈可击。色伽兰氏《中国西部考古记》中,称此阙为渠县诸阙之代表作,颇为中肯。”(见刘敦桢.川、康古建筑调查日记[M]//刘敦桢全集(三).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321.另参见:冯棣,黄沁雅,黄福丹.半部中国建筑史的佐证研究:梁思成及营造学社在西南的学术史贡献[J].建筑学报,2021(9):70-77.

㊸滨田耕作著,刘敦桢译注.法隆寺与汉、六朝建筑式样之关系(1926年5月)[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1):10. (按:“天平时代”指710—794年日本以平城,即今奈良为京城的时期,更具体指圣武天皇统治的729—749年,“白凤时代”为645—710年。此处译文有误,原文为:“天龙山の石窟に於いては北齐时代即ち丁度法隆寺创立时代から白凤期の初めに於いて法隆寺式と同じ系統の建筑様式を認めるのであつて,是は美术史上頗る重要な事实である。”或当译为:“天龙山石窟所在的北齐时代恰为法隆寺创立的时代至白凤时期初期,与法隆寺可称是同一系统的建筑样式,这是美术史上颇为重要的事实。”)

㊹田边泰著,刘敦桢译注.“玉虫厨子”之建筑价值[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1):61-74.

㊺刘敦桢.“译者眉批”见:《“玉虫厨子”之建筑价值》并补注[M]//刘敦桢全集(一).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33.

㊻乐嘉藻.中国建筑史[M].二编上.杭州:作者自刊,1933:附图31-34.

㊼刘敦桢.复艾克教授论六朝之塔(1933年3月)[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3,4(3):138-147.

㊽赖德霖.梁思成《中国雕塑史》与喜龙仁[J].万象,2011,13(8):1-25.

㊾朱启铃,刘敦桢校注.梓人遗制[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4):135-176.

㊿朱启铃辑本,刘敦桢校补.哲匠录(续)[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5,6(2):116-157.

①刘敦桢.宋·李明仲《营造法式》校勘记录(1933年4月)[M]//刘敦桢全集(十).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1-84.关于单士元,可参见:王其亨,何澍洁,张杰.建筑史家单士元的学术人生——纪念单士元先生逝世20周年[J].建筑师,2018(2):33-40.

②刘敦桢.《鲁班经》校勘记录(1961年)[M]//刘敦桢全集(五).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1-7.

③刘敦桢.《万年桥志》述略[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3,4(1):22-38.

④刘敦桢.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3,4(2):100-155;1933(3&4):271-339.

⑤刘敦桢.明长陵[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3,4(2):42-59.

- ⑭刘敦桢.牌楼算例[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3,4(1): 39-81.
- ⑮梁思成.再版序(1934年5月)[M]//梁思成著.清式营造则例.2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1: 132-133.
- ⑯刘敦桢.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3): 1-96.
- ⑰庞骏.经学诠释与三朝五门制度:以隋唐宫室制度为例[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7(5): 92-99.
- ⑱阙铎.任启运《宫室考》校记[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1,2(1): 1-5.
- ⑲朱启铃.中国营造学社缘起(1929年3月24日)[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0,1(1): 1-6.
- ⑳社事纪要[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0,1(2): 3.
- ㉑刘敦桢.大壮室笔记[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3): 129-172.
- ㉒傅熹年.读《刘敦桢全集》体会[M]//刘敦桢全集(一).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 ㉓刘敦桢.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3): 1-69.
- ㉔关于刘敦桢对易县清西陵的研究,参见:周悦煌,王其亨,王巍,张凤梧.中国古建筑研究的经典范式:《易县清西陵》[J].建筑师,2021(6): 31-39.
- ㉕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0: 286, 350.如刘在讨论天坛建筑时说:“封建帝王对于天坛的建筑的设计,有着严格的思想要求,最主要是在艺术上表现天的崇高、神圣和皇帝与天之间的密切关系。例如,圆丘、皇穹宇、祈年殿平面都为圆形,内外围墙和祈年殿、圆丘间的隔墙作弧形,附会了古代‘天圆’的宇宙观。圆丘的石块与栏板数目也附会天为‘阳’的奇数加或其倍数,并附会‘周天’360度的天象数字。而祈年殿的内外三层柱子的数目,也和农业有关的十二月、十二节令、四季等天时相联系。各主要建筑用蓝色琉璃瓦是象征‘青天’。通过这一系列的处理,给建筑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梁思成《中国建筑史》中的相关讨论则是:“圆丘为祭天之所,为坛三层,其平面圆形,盖以象天也。坛全部白石砌成;每层均周以栏楯,四面均出踏道九级。上层径九丈(营造尺),下层径二十一丈,共高约一丈六尺。坛之四面绕以矮垣,曰‘壝’,每面设棂星门三道。其北门之北为皇穹宇,为一平面圆形单檐之小殿,盖平时安奉上帝神位之殿也。……祈年殿在圆丘之北,祈谷之所也;在明本称大享殿,至乾隆十六年始改今名。祈年殿之后为皇乾殿,平时安奉上帝及配祀诸帝神位。祈年殿平面圆形,檐三重,上安金顶,立于三层圆坛之上。其坛之制略如圆丘,而径较大,殿用内外柱二周,各十二柱,中更立龙井柱四。圆周二周均安格甬门,无砖壁。皇乾殿五间,单檐庑殿顶,立于单层石基之上,基四周亦绕以石栏。祈年殿本明建,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毁于雷火,翌年重修,即现存殿是也。皇乾殿及祈年殿前之祈年门,则尚为明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竣工之原构。”(梁思成全集(四)[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188-189.)
- ㉖赖德霖.经学、经世之学、新史学与营造学和建筑史学——现代中国建筑史学的形成再思[J].建筑学报,2014(Z1): 108-116.
- ㉗刘敦桢.琉璃窑轶闻[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3): 173-177.按:中国营造学社曾“访求匠师、采集

- 实物”,又在1931年2月“成立琉璃瓦料研究会,与各会员逐次讨论,并组织调查团,前赴门头沟琉璃渠村旧琉璃官窑,实地踏查,向窑主兼厂商赵雪访借来现品数百余件,在中山公园,与其他窑厂出品,同时陈列。与在平征集所得各种现品,比较研究。”(《本社纪事》[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1,2(1): 6-7.)刘敦桢的这篇文章当是在这一背景下所写。
- ㉘刘敦桢.石轴柱桥述要(西安灞、浐、丰三桥)[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4,5(1): 32-53.
- ㉙朱启铃.中国营造学社缘起(1929年3月24日)[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0,1(1): 1-6.
- ㉚古瓦研究会缘起及约言[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1,2(2): 2.
- ㉛本社征求营造佚存图籍启示[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0,1(2): 2.
- ㉜朱启铃.存素堂入藏图书河渠之部目录[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4,5(1): 98-117.
- ㉝郭湖生.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东方建筑[J].建筑师,1992(4): 46-48.
- ㉞赖德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技术科学的结合——中国建筑史研究方法初识,兼议中国营造学社研究方法“科学性”之所在[C]//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编.刘敦桢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暨中国建筑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 163-168.
- ㉟赖德霖.文化观遭遇社会观:梁刘史学分歧与20世纪中期中国两种建筑观的冲突[M]//朱剑飞主编.中国建筑60年(1949—2009):历史理论研究.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246-263.
- ㊱赖德霖.图像观念与语境.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析读[J].建筑师,2021(6): 89-101.
- ㊲朱启铃.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1930年2月16日)[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0,1(1): 1-10.

#### 参考文献

- [1] 丁垚,李晓,杨朝.刘敦桢《天津阁四库本《营造法式》校勘记》[J].建筑师,2022(5): 33-38.
- [2]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编.刘敦桢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暨中国建筑史学史研讨会论文集[C].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
- [3] 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9卷)[M].合肥:黄山书社,1994.
- [4] 冯棣,黄沁雅,黄福丹.半部中国建筑史的佐证研究.梁思成及营造学社在西南的学术史贡献[J].建筑学报,2021(9): 70-77.
- [5] 郭湖生.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东方建筑[J].建筑师,1992(4): 46-48.
- [6] 赖德霖.中国近代思想史与建筑史学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
- [7] 赖德霖.图像、观念与语境: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析读[J].建筑师,2021(6): 89-101.
- [8] 林洙.叩开鲁班的大门——中国营造学社史略[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
- [9] 刘敦桢.刘敦桢全集[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 [10] 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

筑工业出版社,1980.

- [11] 刘江峰,王其亨.中国建筑史学的文献学传统[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7.
- [12] 鲁迅.鲁迅全集(四)[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13] 南京工学院建筑研究所.序[M]//刘敦桢文集[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
- [14] 南京市档案馆,中山陵园管理处编.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 [15]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七)[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
- [16] 庞骏.经学诠释与三朝五门制度:以隋唐宫室制度为例[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7(5): 92-99.
- [17] 涂颖佳,徐苏斌,青木信夫.“天竺样”·维特鲁威·建构与营造学社:从艾克《亭式石塔I》的写作看20世纪30年代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建筑的历程[J].建筑师,2022(5): 19-38.
- [18] 王彬彬.启蒙即救亡——“九·一八事变”后鲁迅关于抗日问题的社会批判[J].文艺研究,2020(7): 61-69.
- [19] 杨永生,明连生编.建筑四杰:刘敦桢、童雋、梁思成、杨廷宝[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8.
- [20] 伊东忠太.支那建筑史[M].(中文翻译见:伊东忠太著.中国建筑史[M].陈清泉译补.上海:上海书店,1937.)
- [21] 俞汝捷.花朝长忆颉园师[EB/OL].新语丝,2004-1-26[2022-10-9]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history/contemporary/qutuyuan.txt.
- [22] 乐嘉藻.中国建筑史[M].杭州:作者自刊,1933.
- [23] 周悦煌,王其亨,王巍,张凤梧.中国古建筑研究的经典范式:《易县清西陵》[J].建筑师,2021(6): 31-39.
- [24] 朱剑飞主编.中国建筑60年(1949—2009):历史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 [25] 朱启铃.营造录——暨朱启铃纪念文集[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
- 尚有其他参考文献来自《东方杂志》《教育杂志》《民国日报》《申报》《时事新报》《苏州明报》《苏州市政筹备处半年汇刊》《中国建筑》《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等。
- 图片来源
- 图9: 历史博物馆倭寇史料延期展览[J].华北日报,1932-10-20(6).
- 图10: 滨田耕著作,刘敦桢译注.法隆寺与汉、六朝建筑式样之关系(第一图)[J].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3(1): 2.
- 图11: 滨田耕著作,刘敦桢译注.法隆寺与汉、六朝建筑式样之关系[M]//刘敦桢全集(一),2007: 22.
- 图12: 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0: 图138-2.
- 图13: 乐嘉藻.中国建筑史[M].二编上.杭州:作者自刊,1933: 图31-34.